

回忆 胡政之

胡玫

王瑾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打开追忆的门扉——

观《大公报》风云际会，品胡政之非凡人生。



回忆

胡政之

打开追忆的门扉——

风云际会，品胡政之非凡人生。

胡玫 王瑾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忆胡政之 / 胡玫, 王瑾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 201 - 06223 - 5

I. 回… II. ①胡…②王… III. 胡政之(1889 ~ 1949) —
纪念文集 IV. K825.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755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960 毫米 16 开本 19.75 印张 4 插页

字数: 220 千字 印数: 1 - 2,500

定 价: 43.00 元

出版说明

胡政之(1889—1949),本名霖,笔名冷观,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主修法律和科学。归国后投身报业,自此逐步成为中国新闻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尤其是他担任《大公报》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后,对于《大公报》的兴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该报在海内外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又反过来诠释了胡政之的非凡人生价值。

时值胡政之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出版这部《回忆胡政之》,以表达对这位中国报界巨擘的无比崇敬和怀念之情。

本书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先生逝世后同事朋友当时发表的一些悼念文章,二是与先生有过交往的人们后来的追忆;三是近十年来人们对先生的评论。书后附先生年表及新发现的先生三篇书序。

本书将向读者展示先生事业上的成就、人格上的魅力,尤其是他的风云人生与他那个动荡时代的相互关联、相互映照。从中可以看到,先生在思想境界上追求真理、追求正义;在经营管理上求真务实、不尚空谈;在人生态度上积极向上,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满怀激情,不舍昼夜地发奋努力。他几十年中与同人们共同奋斗,成就了《大公报》作为民国年间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的盛名,也让一批在《大公报》得到锻炼的记者成为民国年间新闻界的风云人物。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胡政之,中国新闻史将

失去非常灿烂的一页。

本书所收文章,不少出自与胡政之有过师谊之情的人之手,这些人日后又成为报界乃至政界学界的名流,如查良鏞(金庸)、杨历樵、费彝民、萧乾、曹聚仁……无疑,本书将带给读者贴近胡政之的切身感受。

斯人早已远去,而他的精神不朽。追寻《大公报》的旧踪,回首20世纪上半叶的报界风云,便可知古人所谓立功、立德、立言谓之不朽,用在先生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但愿本书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先生,怀念先生。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年5月25日

序

方汉奇^①

胡政之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是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从1912年4月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新闻作品起,到1949年4月辞世之日止,他从事新闻工作近40年,先后在《大共和日报》、《新社会报》、《国闻周报》、《大公报》和国闻通讯社等新闻媒体担任过编辑、记者、主编、主笔、经理、总编辑、总经理等各项职务,以毕生的精力献身于中国的新闻事业,生死以之,无怨无悔,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十分值得重视的人物。

胡政之是学法律的。留日期间主攻的是政法。但他终身从事的是新闻工作。在新闻事业领域内,他显示出了超常的才华。新闻工作的方方面面,包括编辑、采访、评论、摄影、电讯、广告、发行、经营、管理等,他都拿得起来,都干得十分出色当行。堪称是新闻业内文武昆乱不挡样样应付裕如的多面手。1916年以后,他两次入主《大公报》,其中后面的一次,主持新记《大公报》的工作逾20年。这20年中,前期还有吴鼎昌、张季鸾的协作,后期则主要由他一人负责,更使他有会充分发挥他在报业经

^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

营管理方面的才干。在他的领导下,《大公报》的各项制度,包括人才录用管理制度、奖金制度、编辑经理两部人才通用内外互调制度的制定,都出于他的擘划。《大公报》上海、香港、桂林等版的创办和战后各版的恢复,特别是香港版的恢复,都出于他的指挥。他还独具慧眼,知人善任,能千方百计地延揽人才,和擢拔使用人才,范长江、萧乾、陈纪滢、徐铸成、梁厚甫、朱启平、李侠文、金庸等骨干力量的发现、引进和录用,都出于他的决定。范长江的西北行和有关边区和红军的系列通讯之得以及时发表,也都出于他的支持。在他的主持下,《大公报》各版的总发行数字,由初办时的几千份,一度增长到20万份,这份报纸也由华北地区的大报,发展成为一度拥有天津、上海、汉口、重庆、桂林、香港等6个版的全国性大报。这一切,当然不能完全归功于胡政之一人,但无疑以他的贡献为最大。《大公报》之所以能够在香港持续出版,成为今日中国的百年老报,追踪溯源,也是厥功独伟。

然而,有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胡政之几乎被遗忘了。即使偶尔被提起,也往往被当作新闻史中的另类典型,而遭到贬抑。这和长期以来的“左”的思潮的影响,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对旧《大公报》的讨伐和批判有关,也和胡政之晚年的某些社会活动不被理解和遭到疵议有关。新世纪以来,旧《大公报》的历史地位及其在当时中国新闻界的作用和影响,得到了辩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报刊上也出现了不少重新评价胡政之的文章,使受众对这位历史人物,有了更多的认识和理解。2007年4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瑾、胡玫主编的《胡政之文集》问世。这部近百万字的文集的出版,也给胡政之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胡政之的研究正在逐步展开,他的传记也即将问世,中国新闻史上的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将重新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焦点。

王瑾和胡玫曾在2002年6月编写一部内部刊行的文集《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收入了胡政之生前的朋友和同事们所写的回忆、纪念文章二十余篇，约12万余字。正式出版的《回忆胡政之》一书，在《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发现的一些回忆文章，并增补不少与纪念胡政之有关的新的内容。既记录了胡政之留给后人的去思，也保存了大量和胡政之立身行事有关的文献资料。它的出版，将有助于对胡政之的进一步了解，对胡政之的研究，也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是为序。

2008年9月15日于北京宜园

胡政之生平

胡 玫^①

“一个良好的新闻工作者对自己的事业与工作”要“有极热烈的兴趣与志向”，这是报业巨子胡政之晚年对同人说的话（《对桂林馆编辑同人的讲话》1943.6.13）。而他自己就是凭着对新闻事业“极热烈的兴趣”和炽热的爱，胸怀理想与“志向”不停的追求着，矢志不渝，最终完成了他新闻生涯辉煌的一生。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被称为“新闻奇才”“报业巨擘”，胡政之是当之无愧的。

胡政之，名霖，1889年6月25日（农历5月27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大家庭中。童年时，他就随去安徽做官的父亲离开了家乡。后来，他曾在安庆高等学堂读书，那是一所教会学校，他聪颖好学，受到西方文明教育，同时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功底。

1906年，父亲病逝于安徽任上，他即退学和母亲扶柩回成都原籍。

一年后，18岁的胡政之用嫂子一副金镯变卖后换作的川资和表兄一起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前后六年中，每天都进两个学校拼命读书”（《胡政之谈民元报业》1947年第11期《人物杂志》）。为了维持每年200元的费用，有时半年打工半年读

^① 胡政之孙女。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已退休），本书编者。

书。他主修法律,德语、法语也是必修科目。他曾说:日本“实吾新智识之发源地”(《欧游漫记》1918.12.16《大公报》)。六年的日本生活,使他对日本社会多有了解,也接触结识了很多日本人。后来胡政之在报海沉浮,在新闻战线打拼,这段日本的留学经历帮了他大忙,令许多和他同时代的报界同行们望尘莫及。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胡政之也结束了学业回到祖国。时年23岁。

不久,胡政之在上海进入章太炎主办的《大共和日报》先后任日文翻译、总编辑;后,“民国四五年,本人在北平当特派员……因与《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熟悉,关于‘二十一条’秘密收获较多,……本人为取得消息,曾和日本使馆官员小幡往来。”(《评新闻学术讲座》1947.8.13《大公报》)。在消息发生一两天后,胡政之就以《万目睽睽之日本要素》为连续报道的总题目,在1915年3月2日至31日的《大共和日报》发表文章,及时、准确、全面地向国民报道了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款全过程及英美德等国的态度,一时成了《大共和日报》的独家新闻。至此,胡政之的新闻生涯也正式开始了。

次年(1916年)10月,胡政之脱离了《大共和日报》,受聘担任天津《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从1916年到1920年近四年期间,他的新闻才华得到了初步显现。他大胆对报纸进行内容和形式上的全方位改革。他提出了“改良新闻记事”的主张,认为“新闻事业之天职有二:一在报道真确公正之新闻,一在铸造稳健切实之舆论”(《本报之新希望》1917.1.3《大公报》)。为充实新闻内容,他在全中国十几个大城市招聘“访员”到新闻发生地“专司采访”,还经常亲自出马。这些新闻都用“专电”、“特约通讯”等形式发回报社登载。在他主持报社期间,全国乃至世界发生的大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其中中、美、德、日的关系;张勋复辟前后等等大事都有及时详尽的报道。他大胆革新

版面,顺应时代潮流,增设传播新思想的教育、文化、经济等专栏。很快,《大公报》重新赢得了当年创办时的声誉,不到一年,销量已过万份。

在此时期胡政之以《大公报》记者身份曾有一次重要的采访活动。这是他一生引以为荣的,也是对我国近代新闻史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一次采访活动。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新闻记者对巴黎和会的采访。1918年底,胡政之离开天津,经日本坐船先到纽约,后到巴黎,是唯一到和会现场的中国记者。从1919年4月到7月,他发回大量“巴黎专电”,撰写多篇“巴黎特约通讯”,对会议情况作了详尽叙述,并发表评论,这些均及时登载在《大公报》上。会后,他又到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瑞士参观访问,特别参观考察了法、德、意、英等著名通讯社,并加以研究,下定了回国创办通讯社的决心。这次出访前后近一年的时间,凭借着精通多国语言,耳闻目睹,胡政之开阔了眼界,增强了知识,得到了一笔日后在新闻事业上大展宏图难得的财富。

1920年5月,胡政之回国,复杂多变的形势使胡政之辞去了《大公报》的工作,一段时间加入北京林白水主持的《新社会报》。他笔耕不辍,短短的几个月就发表了上百篇评论文章。1921年6月,《新社会报》创刊一百号,他发表感言说:“要改造世界,先要改造国家,改造社会。而改造人,又是改造世界国家社会的根本……我们做新闻记者的改良新闻事业,实是个人改造之一端。改造的前途无涯,个人的努力也不应有止境。”(《本报一百号的感想》1921.6.9《新社会报》)。可以看出,胡政之通过新闻事业改造国家和社会的理想和信念是何等明确坚定!

1921年8月,上海《申报》、《新闻报》刊登出署名胡霖的“国闻通信社开办预告”,接着上海国闻通信社总社在上海成立,并相继开设汉口、北京、天津、沈阳等分社。仅仅两年,胡政

之就兑现了采访巴黎和会时心中许下的诺言。1924年8月,《国闻周报》在上海创刊。当时,国内政治形势险恶,“五卅惨案”的发生,两位正义敢言的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的相继被杀,都没有动摇胡政之办报的决心。刚刚过而立之年的胡政之毫不畏惧,单枪匹马开创着自己的事业。他曾对人谈起开创这一事业的动机:“今天文人报国首先需求解除国家的桎梏,精神获得独立。”“帝国主义者不但侵占中国领土的主权,而且也操纵中国人的视听……所以我之办通信社就是与外国通信社争取中国新闻报道的独立,办杂志是争取舆论的独立……我们是在外国钳制中国舆论、操纵中国新闻的情势下,改变了中国人读报、听新闻的信心,与建立了中国人论中国事的透彻的自尊。”(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

国闻通信社的创办是成功的。它的起点高于当时国内其他民营通讯社,他的稿源来自全国乃至国外,发稿的范围也由国内扩展到国外。他曾对人说过,看到了国外通信社的发展,“使我坚定了创办国闻通信社的信念。以全国新闻发扬中国新闻事业,以中国新闻提高国际新闻事业中的崇高地位”。(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所以,国闻通信社“一开幕就是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国闻通信社于抗日爆发前结束,它是胡政之后来接办《大公报》的一次绝好准备和演习。

和国闻通信社一样,《国闻周报》因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公正,版面的灵活、丰富、创新很受读者欢迎。如果说不同,国闻通信社侧重的是刊载汇集而成的确实的消息和不加评论的事实,以供新闻界采用;而《国闻周报》则更重“秉独立之观察,发自由之意见”(发刊词)。《国闻周报》创刊一年后,发行量超过三千份,创办八年后,每期发行约二万份,是“国内同类刊物中发行量最大的”(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著名记者陈纪滢在20

世纪70年代曾说过：“据我近十五年来参观世界各大图书馆的经验，《国闻周报》是他们珍藏中国杂志的一种。出版了十六年的《国闻周报》，遂成了检查中国历史最有参考价值的文献。”（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这份周报在胡政之接手《大公报》后仍坚持出版，并伴随着胡政之一起走入他一生报业生涯的鼎盛时期，直到抗战爆发才不得不停刊。

1926年9月1日，已经关闭多日的《大公报》在天津重新开张。这是吴达诠、张季鸾、胡政之联合以“新记公司”的名义开办的。这也是胡政之第二次进《大公报》。在此以后的23年中，吴达诠从政离开，张季鸾不幸病逝，只剩下胡政之始终坚守在他钟爱的这块沃土上，历经磨难、辛勤耕耘，倾注了全部心血。在他一生中，这23年，如果除去童年和早年求学的岁月，实际占去了他生命一半以上的时间。胡政之的理想和抱负，胡政之的才华和能力，胡政之的人格和操守，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从《大公报》被接办到1936年4月上海馆开办前10年间，三人分工中，作为总经理的胡政之都有哪些业绩呢？

三人联合办报，而且越办越好，这本身就是个首创。而敢于开创，勇于创新从来就是胡政之人生的最大特点。

当时的中国，南北大战正酣，天津在旧式军阀统治下，反动潮流高涨。办报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胡政之总揽经营管理大权。他在另两位合作人的充分信任和大力帮助下，迎难而上。他认真遵守他们共同制定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原则，不接受任何政治资本和个人金钱，不畏惧当局种种刁难和打压，巧妙周旋，精心擘划。“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日本人对《大公报》所在地的寻衅闹事，他亲临现场指挥搬迁，在异地坚持出报。1932年“一·二八”日军轰炸上海，他积极组织稿源，每天在《大公报》上用大号黑体字报道上海战况，并代收慰劳抗日军队捐款。1933年“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前，他即安排记者到

东三省采访,将采访文章和实地拍摄的照片一并在《大公报》9月18日增发的纪念特刊上发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胡政之的魄力与才干非同一般。

在报社人员上,胡政之除充分使用他带过来的“国闻”人马及原《大公报》的部分老员工外,他还善于发现人才,并大胆使用和培养。1935年5月,胡政之支持鼓励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赴川南、西北采访,这在当时是既具远见,又要有胆量的。在此之前范长江就曾在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报社碰过钉子。随着《大公报》连续刊登范长江发回的旅行通讯,人们不仅了解了红军长征,陕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大公报》声誉也随之高涨,而范长江本人也出了名,后来在胡政之的授意下,《大公报》将范的通讯结集成册,这就是曾经七次再版的著名通讯集《中国西北角》。就在这同一年里,刚结束学业的萧乾,也由五年的兼职撰稿人正式进入《大公报》,被胡政之委以重任,主持《大公报》重要的副刊《文艺》(原为《文艺副刊》和《小公园》)。

在胡政之的苦心经营、科学管理下,《大公报》实力、规模不断扩大,销量大增。复刊一周年日发行量由初期的2000份增至6000余份,广告收入千余元,在北方站稳了脚跟,且呈蒸蒸日上的趋势,至1936年沪版创刊,日销已达10万份。这一切当然也离不开《大公报》全体同仁齐心努力的工作。特别是吴、张二位合作者。他们三人的精诚合作,亲密配合,“除依靠合理的制度外,还需要靠道义、修养、互信和那份坚固不渝的感情……”(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至于其各自的作用,有人这样评价:“大公报之驰誉国际,虽系季鸾先生心血所致,而政之先生之擘划,大有力焉。”这是非常中肯的。

副总编辑,是胡政之在新记《大公报》的另一身份。已有过多年报业经验的胡政之,精心设计、安排扩大版面,增设多种专业性副刊,开辟“星期论文”,聘请社会名流、学者撰写文章等

等。而最有特色的《大公报》社评，往往是胡、张、吴三人商议后，一人执笔。据当时在场、熟悉《大公报》的人说：“政之先生不徒长于办事且擅长文笔，尤其国际问题，往往剖析入微。”（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看来那一篇篇国际性政论文章，大约都是胡政之的手笔。

记者出身的他，外出采访更是轻车熟路。从接办《大公报》到1936年上海馆创办前的十年间，他离开报馆外出十余次：他曾远游南方考察北伐军、武汉国民政府，访孙科、宋子文；入京访东北军长官，见白崇禧、阎锡山；他曾三次出关作东北之游，见张学良等军政要人；“九一八”后他即刻入京至协和医院见张学良，是事变后记者中见张的第一人；他出访两粤，赴香港见胡汉民；赴南方五省两次面见蒋介石；赴香港见李宗仁、陈济棠等等。

除国内出访，他还在1935年5月亲率《大公报》一队人马去日本。一个月的时间，胡等在大阪、京都、东京、名古屋等地马不停蹄、终日奔走，参观“朝日”“每日”等报馆，会见报馆主笔和编辑局长，参观印刷所和印刷机器厂。同时，由于早年留学日本，这次还见到了很多已成了日本政界、外交界、文化界要人的旧交。如胡政之所言，这次日本之行，是当“学生去的”，以“补充智识”为目的，他是一心以日本和发达国家为榜样，谋求《大公报》的创新、不断发展。

频繁的外出采访，加上繁重的管理经营工作，却从未让胡政之放下过笔杆。据统计，从1926年9月至1936年4月，胡政之共写下的仅登载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的署名文章就有百余篇，其中“时评”和“新闻”最多。这还不包括他执笔而未署名的社评。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胡政之的思想主流始终是积极向上的：他赞扬孙中山，反对军阀混战，又在亲身的实地考察中逐渐转变思想，给北伐军和南方革命政府的成绩以较高评价；他在“九一八”后积极主张抗日救国，在《大公报》上多

次撰文赞扬那些有民族气节、英勇抗战的民族英雄。

十年间,胡政之鞠躬尽瘁,“从未旁骛”,抵制住了各种高官厚禄的诱惑,牺牲了个人的享受,同人说他“犹如一机器人,自早至晚工作13个小时,全身心投入报馆事业中”。自1926年接办到1936年移师上海,《大公报》由一家濒于倒闭的地方报,发展成全国性大报,如此成就,纵然是全体同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他们的老板胡政之身先士卒、呕心沥血,尤其功不可没!

如果说,从当年在上海进入《大共和日报》,到开办国闻通信社、创办《国闻周报》和后来经营《大公报》这段生涯,胡政之是一个在近代新闻战线上披荆斩棘的执著开拓者,难得的新闻全才;那么,从抗战爆发前又来到上海,创办《大公报》上海馆,到最后结束生命于上海,这13年的岁月,我们看到的则是一名历经磨炼,更加成熟的报业家,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同时,也是一名为国家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为世界和平呼喊、效力的社会活动家。

这13年,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6年2月—1937年12月

这一阶段,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国难当头,办报极为困难。这期间,天津馆关闭了;上海馆开创后又关闭;汉口馆刚刚创刊却又面临日军对武汉的近逼。但是,胡政之和张季鸾两位对国家和民族满怀热血的报人,没有退却。为了《大公报》能薪火相传,为了宣传抗日的心声能永不停歇,一方面,上海馆还在坚持出报,及时报道战地新闻,给抗日军民鼓劲;另一方面,胡政之调集人马往武汉,由张季鸾带队,准备创办汉口版。1937年8月,并肩战斗多年的老友不得不第一次分开。临行前,胡政之对张季鸾说:“我相信中国抗战免不了毁灭一下,但毁灭之后一定能复兴。本报亦然。我留沪料理毁灭的事,愿兄到内地努力复兴大业。”胡政之坚守到1937年底,接到日军要求“新闻检

查”的通知,于是《大公报》发表了《暂别上海》、《不投降论》的停刊社评:“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昨天敌人通知使我们决定与上海读者暂时告别。”《国闻周报》也就此停刊。

第二阶段:1937年底—1941年9月

在这一阶段近四年时间里,抗日战争逐渐走入艰苦的相持阶段,这对胡政之和他的《大公报》同人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随着全国政治中心向大后方转移,1937年除夕,《大公报》部分骨干就奉胡、张之命到重庆筹备建馆。而胡政之本人则在1938年3月率人马赶赴香港,亲自领导港馆建设。香港环境生疏,开创基业可说是举步维艰。胡政之千方百计网罗人才,组建队伍,终于在8月13日上海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出版了《大公报》香港版。胡政之在亲自撰写的《本报发行香港版的声明》中说道:“在这一年的民族神圣自卫战之中,我们在津在沪的事业都玉碎以殉国。只余一汉口版……现时依然奋斗着……中国民族解放的艰难大业,今后需要南华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所以我们更参加到港粤同业的队伍里来……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支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渗透在字里行间。不到两个月,销路激增到5万份。不但国内发行范围广,“世界各地,凡有中国使领馆、中华会馆和中华学校的地方,几乎没有一处不是本报港馆的直接订户。这种情形,为国内任何地点办报所未有”。(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

然而,胡政之凭着敏锐眼光和清醒头脑,已认清日军的野心,深知港九非久留之地。于是,继汉口馆闭馆,重庆馆开创后,胡政之又派人于1940年冬赴桂林筹建桂馆。并于年底亲临督阵。1941年3月15日,桂版创刊,抢在了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前。这就保证了《大公报》始终没有因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而停止一天出报。这时的胡政之已年过50。他有时